



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述论

*gansu wenhua chuancheng
yu fazhan shulun*

胡 潇 胡秉俊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述论 / 胡潇, 胡秉俊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226-04153-6

I. ①甘… II. ①胡… ②胡… III. ①地方文化—文化发展—研究—甘肃省 IV. ①G1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71438号

责任编辑: 赵金祥

封面设计: 马吉庆

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述论

胡 潇 胡秉俊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海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9.75 插页 4 字数 164 千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153-6 定价: 28.00 元

从文化的视角关注社会现实（代序）

秉俊

胡秉俊与他正在读大学的爱女胡潇合著《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述论》，请我点评并为之序。

秉俊 1978 年考进大学，1982 年参加工作，十五六年前在兰州大学读文化传播方向硕士研究生时是我的学生，而且是那批硕士生中的佼佼者；胡潇 2008 年考上大学，现在是在校大学生，年仅二十出头。父女二人为何共同关注甘肃历史文化这个课题，怎样进行研究、思考和讨论，现在的文科大学生思想状况如何，两代人的认识能够统一到什么程度，这些疑问使我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从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文稿中，我读出了作者的故土情结、文化积累和人生思考，读出了忧思、探索、责任和担当，掩卷长思，颇多感触和感动。

其一，内容比较丰富，有一定的知识性。《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述论》是一部深度思考甘肃文化特色及其传承与发展问题的专著，由甘肃史前文化之谜及思考、甘肃人文地理环境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及协调、丝绸之路文化兴衰对甘肃人文思想的深刻影响、甘肃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四个大专题和结语共五个部分组成。作者深入探析古生物时代、石器时代、史前图画与类文字符号、甘肃地理环境及主要民族、甘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接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早期商业文明对甘肃文化的影响、兴盛的丝绸之路

文化对甘肃的影响等问题，并就丰富的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文化旅游资源的协调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深入思考。论述时间跨度大，笔端所触最早涉及古生物时代，空间以甘肃为主，又不拘泥于一地。对史前文化、彩陶文化、始祖文化、丝绸之路文化、游牧文化、先秦文化、民俗文化及其在当代的延伸和发展，条分缕析，进行了气派颇大的梳理与深思，并恰如其分地应用到论述中。正所谓：史料传说，旁征博引；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所述所论，气势恢宏，大气磅礴，与甘肃文化精神气脉相通，内容之丰富，资料之详实，大大超出我的想象，相信其他人读来一定会有同感。

其二，思路比较开阔，有较强的现实性。谈历史文化并不新鲜，可以说前人之述备矣。谈甘肃文化局限更大，要谈出新意难之又难。可喜的是，作者紧紧围绕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这个主题，并以之为主线，深刻剖析历史文化对甘肃经济社会以及人文思想的影响，从文化的视野和角度，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甘肃是文化大省，各类文化资源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但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甘肃目前处在经济社会“欠发达”甚至“落后省份”之列。面对甘肃在新时代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困惑，我们听到的要么是无关痛痒的议论，要么是自嘲式的揶揄，还有发泄式的抱怨，以及老生常谈或者不切实际的措施和办法。这本述论则立足现实，着眼于解决问题。虽然有些想法未必成熟，但其中闪烁出的智慧的火花，足以令人耳目一新，浮想联翩。例如，论述孤竹君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坚持操守，不吃周朝粮食，逃奔到甘肃渭源县首阳山隐居的历史事实，他们联系到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与整合，如此创意：“伯夷、叔齐逃奔的过程中，可以展现甘肃的黄土高原风貌及人情风俗；他们隐居首阳山可以展现这里的优美风光；他们‘采薇而食’，可以推介甘肃著名的特产‘薇’等原生态纯绿色无污染野菜。”又如：他们引用一位作家朋友的设想，“以甘肃秦安大地湾彩陶文化为依托，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结合交融为背景，以长江、黄河、昆仑山、草原、沙漠等自然要素和神话传说、游牧文化、农业

文化等为素材，通过古朴原始的舞蹈、音乐、故事，表达自由时代远古人类进行文明创造的精神气息”创作一部史诗性的大型舞剧。还有，谈彩陶文化的发展及文字来源，谈丝绸之路文化的兴衰，谈陇东古代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关系，谈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等等，不但时有创见，而且颇具现实意义；而任何科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意义，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其三，立意志在高远，有较强的思想性。纵观全文，有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条明线是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另一条线索就是作者发出的“天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作者试图通过史前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神话传说、文献资料等，解密人类从哪个历史深处如何走来。同时，他们从甘肃史前文化发展历史中寻找答案，继续探知人类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到哪里去？正如文中所说，“现在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只能代表目前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认知水平”。这样发出“天问”，“也许面对的，只能是浩渺而悠远的星空。而我们的姿态与神情，其实与大地湾出土的那件人面陶瓶上的史前人像一样迷茫、执著、忧虑，同时，充满着深沉的人文关怀”。但是作者并不放弃寻找答案！其结论振聋发聩：“我们生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虽然，以人类现在的认识水平，我们还不能彻底解释清楚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传承过去，联结未来！”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最大限度地吧历史与未来联结起来，标记好“现在”这个坐标点。“我们存在的方式就是在行进中保持不偏不倚的直立姿态，然后，留下自己坚实深刻的脚印。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脚印对后人意味着什么！这个脚印，应该是孕育新生命之所在。这个脚印，继往开来！”在为之击掌叫好的同时，我再一次被感动。由此看来，此专著不但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哲学思考，实为不易！

其四，文笔优美流畅，有很强的可读性。例如，关于第一只彩陶的发明：“……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想象：在远古先祖中，曾经有一位制造陶器的能工巧匠，聚精会神，用刮削器修理陶器坯时，不小心划

破了手指。当他感觉到时，鲜血已经在陶器坯上留下了曲曲弯弯的红色印迹……当这件另类的陶器出现在部落人的视野中时，原始先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能工巧匠受到启发，便想方设法地在素陶上有意识地画上纹饰和动物、山川、日月等形象。或许这位能工巧匠某一天忽发奇想，将不同于黏土颜色的其他土石成分抹到陶器上入窑烧制。也许，这位能工巧匠就是伏羲最初的形象。”这简直就是一则美丽的、充满童真意趣的现代神话！他们自由联想，把藏区流行的集体舞蹈“锅庄”与“彩陶舞画”及洋溢着原始文化精神的非洲舞蹈进行类比。这些缺乏严格学术论证的“论述”，估计来自女儿坚持自己的想象。有些观点，明显的，父女俩并未达成一致，秉俊或许是以宽容的态度“姑且存此一说”。但是，无论是对人生的思考，还是对现实的忧患；无论是引经据典，还是自由想象；无论是振臂呐喊，还是娓娓道来，优美的文笔贯穿始终，可读性在同类文稿中当属上乘。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因为是合著，有些地方风格不尽一致，甚至存在时而深刻，时而稚气，不够均衡的问题。个别地方，或有牵强之感。但是，这并不影响文稿的整体水平。

时下社会处在转型时期，空气中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许多人包括很多成年人都很难静下心来读书、思考。秉俊和胡潇能够长时间集中研究一个专题，日积月累，获得如此成果，令人感慨万分。我想，这本文化专著，对我们的教育体制，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包括对诸多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很有一些启发意义。

祝愿胡潇以及广大的“80后”“90后”年轻朋友们，能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思考，脚踏实地做人、做事、做学问。如此，则明天一定更美好！

文短情长，是为序。

2011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从文化的视角关注社会现实（代序） / 吴小美001

第一篇 甘肃史前文化之谜及思考 / 001

一、古生物时代：人类远祖“韬光养晦” /002

二、石器时代：从茹毛饮血到熟食 /005

三、彩陶：雕塑与彩绘的历史 /009

四、彩陶纹饰：史前图画与类文字符号 /017

五、天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024

第二篇 甘肃人文地理环境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及协调 / 029

一、甘肃的地理环境及主要民族 /029

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 /032

三、甘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接轨 /055

第三篇 丝绸之路文化兴衰对甘肃人文思想的深刻影响 / 067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069

二、早期商业文明与甘肃 /072

三、兴盛的丝绸之路文化与甘肃 /075

四、商道衰落的主要原因 /082

五、丝绸之路文化衰退对甘肃人文思想的深刻影响 /086

第四篇 甘肃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 / 115

一、丰厚的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大
推动力 /118

二、文化旅游资源的协调开发与生态保护 /126

结 语 继往开来 / 145

第一篇

甘肃史前文化之谜及思考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会之处，是古代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融合的文化地带，是中国远古人类的主要聚居地和古代农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解读甘肃史前文化之谜，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的大量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文化信息和密码。

甘肃境内保存着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址和人类智慧奇观。据有关资料，全省馆藏文物 40.7 万余件，现存地上地下古迹 1.3 万多处，其中 1000 余处史前文化遗址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及姿态万千的多民族文化历史。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大地湾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等多处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古朴凝重、形式多样的彩陶，使甘肃成为举世闻名的“彩陶之乡”。从大约 8000 年前、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彩陶开始，经历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不同阶段，延续 5000 多年，形成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尤其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甘肃省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几乎贯穿了中

华文明产生、发展、壮大、鼎盛的全过程，有着非常丰厚的文化积淀。换句话说，甘肃深厚的黄土层中蕴藏着华夏先民在历史时空中匆匆而过的足迹，在丰富多彩的古代文物、传说、建筑、古歌、舞蹈、绘画、宗教、民俗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承载形式中，蕴藏着解开中华文明之谜的密码。以前，当我们每每论及“文化积淀”时，基本上都局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有文字的历史在人类产生、发展的久远长河中只是很短一段。可以肯定地说，漫长的史前文明为中华文明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大地上有很多史前文明遗址。根据大量考古发掘文物证明，远在 2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甘肃就有远古人类生息、繁衍，至今仍然存活着的民间传说、风俗民情等文化现象也忽明忽暗地印证着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导九川”，其中有六条河就在甘肃境内，即弱水（今张掖黑河）、黑水（今酒泉疏勒河或党河）、黄河、漾水（今西汉水）、岷江和渭河。我们在不断探求人类文明的脉络，而先祖们的智慧之光，则激发我们向历史深处凝眸，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如何出现在时空坐标中，又如何刻画着自己的生命坐标？

一、古生物时代：人类远祖“韬光养晦”

目前，人类能够“看”得最远的时空，应该是远古生物时代。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水平作出的判断，那个时代的霸主是称雄地球长达 1.6 亿年、充满着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恐龙。恐龙最初是怎样诞生的？如何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类别多样、躯体庞大的古怪模样？为什么又在距今约 6500 万年前全部消失？这些问题仍在研究之中。一些推断似乎靠近历史真相，更多的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所幸，甘肃境内存在着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提供了一把可能揭开这些古代谜团的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完整清晰的刘家峡恐龙足印群。目前已经揭露的总计 710 平方米的岩层层面上，发现 8 类 30 组 270 个足印，这里面至少包括两类巨型蜥脚类、两类兽脚类、一类似鸟龙类和其他三类形态独特、尚未归属的足印。在同一岩层层面上还保存有恐龙卧迹、尾部拖痕及粪迹等，构成足印、卧迹、拖痕和粪迹共存的场面，非常独特。据专家研究，同一地点出现如此多样的食草类和食肉类恐龙足印，在国内尚属首次，世界上也极为罕见。附近地区，也发现了多处恐龙骨骼化石，为进一步研究恐龙类别、研究足印遗

迹与造迹生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恐龙生活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把钥匙是甘肃北山公婆泉地区。那里是一处大型中生代陆相盆地，出土了距今 1.2 亿年至 8000 万年的恐龙、鱼类、植物和恐龙蛋等古生物实体和遗迹化石。仅仅在盆地西南和东南边缘地带就发现 9 种恐龙化石及 5 个新属种：张骞丝路龙、马鬃山原巴克龙、大岛氏古角龙、马鬃山鹦鹉嘴龙和布林氏南雄龙等等。植物化石（包括大型硅化木）也十分丰富。通过解析重拟，可以展现 1.1 亿—1.5 亿年前北山山地的壮丽生态环境！

第三把钥匙是临夏盆地的古动物化石。仅在位于该盆地的和政县目前已经征集到 5700 多件古动物标本，代表着近百种早已灭绝的哺乳动物，它们分别属于距今 1500—1200 万年的铲齿象动物群、距今 1000—700 万年的三趾马动物群和距今约 200 万年的真马动物群。其中，属于三趾马动物群的材料特别丰富，化石、头骨数量之多，不但远远超过了山西保德的三趾马动物群，而且也超过著名的最早发现三趾马动物群遗迹的希腊。

第四把钥匙是黄河古象。这种象的学名叫黄河剑齿象，1973 在甘肃合水县板桥公社马莲河畔一个名叫木瓜沟嘴的地方意外发现。令人称奇的是，古象出土时各骨骼基本完整，甚至连化石中极为罕见的舌骨和仅 3~4 厘米长的趾骨末节也被保存下来，并且肢骨中各骨节还仍然相连。真是奇迹！当时，化石保存在 12 平方米的岩层里，象身近似于站立姿势，后足倾斜，似乎失足跌入泥淖中而无力自拔，就永远站在那里，直到被深埋在土层中，变成坚硬的化石。再次见到阳光时，已经离开第四纪更新世早期 250 万年左右。它的家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倘若古象能够复活，也只能是悲剧：因为，这个庞然大物高 4 米，体长 8 米，门齿长达 3 米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不要说它心灵极其孤独，仅仅就其生存来说也是个很大的难题——它很难找到立足之处和可以果腹的食物。

这四把钥匙似乎是造物主为了帮助人类解密远古时代而特意留下来的。从分布区域看，正好在甘肃的东、中、西部。换句话说，刘家峡恐龙足印群、北山公婆泉盆地古生物实体和遗迹化石、临夏盆地的古动物化石、黄河古象化石驮载着甘肃大地在远古历史长河中沧海桑田巨变的壮观画卷，气宇轩昂地走近现代，并在我们眼前徐徐打开，展现漫漫史前时代大自然作为万物家园的美丽状态。这些雄踞地球的巨兽不可一世，目无神灵，为争夺树

林、河流、湖泊、山川进行残酷的厮杀，场面壮观，激烈，经久不息。那时候，人类远祖无论何种状态，都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他们或许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看大型动物之间发生血腥战争，其悲惨程度又使他们胆战心惊，只能远远地躲藏在茂密的树冠间或林荫深处，闭上眼睛，捂着耳朵，颤抖不已。当战争连绵不断，超出他们的忍受程度时，或许又幻想更强大的动物来把这些性情暴躁又好战的家伙彻底消灭。人类恐惧的感觉，大概最初就酝酿在这种生活情景中吧。

恐龙称雄地球长达 1.6 亿年，在其统治下，还有无数种形态各异的动物。那是漫长的、血腥的、弱肉强食的时代，人类远祖不管从体形、力量还是数量上，都处于劣势。好在他们食量不大，又便于藏匿，在群雄逐鹿中生存下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可以叫韬光养晦。如果不是地球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韬光养晦”也许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根本没有什么现代文明、现代工业之类。要么在某一次瘟疫及其他灾祸而中断。果真如此，不敢想象，因为那样就没有今天的人类！

但是，地球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现代科学对这种巨变进行了多种推测，新的推测还将不断产生。不管这些推测的可信度如何，都不能否认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地球生态环境变化，主要指地球上的生物结构，包括植物和动物结构，也许还有微生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甘肃出土化石的情况得知，这种变化不是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正是这一次次变化，成就了在树顶上“韬光养晦”的人类远祖。

我们以陇东高原的远古动物化石为例，看看人类远祖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地被推向历史进程的最前沿。

陇东高原发现过白垩纪的鱼、原始牛、披毛犀、最晚鬣狗和中国罕见的翼龙（即环江翼龙）等古动物化石，还有喜欢潮湿的莎草植物、适宜干旱的蒿属植物和见于亚热带的柝属植物的标本。由此推断，古生代的陇东还是一片汪洋。或许，当年刘家峡的恐龙曾经巡视过这里呢。到了三叠纪，部分湖底隆升成为陆地，经过白垩纪地壳抬升，到第三纪，一个广阔平坦的剥蚀面终于出现在阳光和空气中。接着，第四纪连绵不断的大风把黄土和岩石风化物搬运、覆盖在这里，河谷、斜坡和原野在太阳的注视下形态不断改变，最后定型为表面完整的黄土高原。不过，那时候气候炎热，沼泽密布，到处森林茂密、花草繁盛，是黄河古象的快乐家园。其实，在这之前，地球动物群

体结构早就发生过最大的一次变化：恐龙消失了。作为一代霸主，其突然消失必然导致大型动物间的“政治真空”，或者引发新一轮的“争霸战”。但是，这样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大概地球上再没有像恐龙一样占据绝对优势的大型动物了吧。所以，在当时的黄土高原上，除了剑齿象、平额象等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中的长鼻类动物外，还有现在看来更适宜生活在荒漠原野上的鸵鸟、羚羊、马、长鼻三趾马、原麝鼠、模拟鼠和喜欢水的鳖类或先或后，或长或短地生活过，它们大多数的化石都曾经被发现。这时候的人类远祖应该开始对“韬光养晦”产生信心了吧！因为，他们的更远祖先很早以前就目睹过恐龙的大批死亡。他这之前，他们认为这种“巨无霸”是不可战胜的。到底是谁战胜了强大而凶悍的恐龙呢？谁也看不见！远祖们是否有朦胧的意识，将其归功于一种模模糊糊的概念化的超能力呢？不得而知！

随着气候的变化及雨水、河流对黄土高原的侵蚀、切割，黄河古象及其伙伴的家园逐渐解体，它们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寻找新的栖息地。当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时，精疲力竭的远古动物们陆续倒地、消失。人类远祖亲历了这一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死悲剧，看着最后一头剑齿象凝望历史远景的眼睛渐渐闭上，看着最后一匹长鼻三趾马无力地倒地而亡，他们非常惊讶，也迷惑不解：是什么强大的动物置它们于死地呢？与以往一样，找不到答案，是不是又归功于未知的超能力？于是神灵的观念比以前更加肯定了，然而还是在一种模糊状态。

终于，人类远祖醒悟到，他们可以比较长时间地离开树顶而四处活动——虽然，黄土高原支离破碎，干旱少雨，也没有星罗棋布的湖泊，但是他们比较自由了。

那个时代，距今大约 250 万年。远古生物虽然逐渐消亡，但是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它们以其丰富多彩的种类和神秘莫测的存在状态营造出了一个“伊甸园”般的生态环境，谱写了悠远浪漫而又惊心动魄的序曲。

二、石器时代：从茹毛饮血到熟食

大约从距今 250 万年开始，人类远祖把生活的中心从树上转移到大地上，接着学会打制和使用石器、骨器，并逐渐直立行走、发展思维，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距今 1 万年左右，学术上称这段时间为旧石器时代，并且相对

于人类远祖体质进化的程度，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就是说，整整 250 万年左右，人类远祖都试图在自然界摆脱“韬光养晦”的生活，他们不断努力的进程反映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中。

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远祖使用过的石器，在东非肯尼亚的科比福拉、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哈达尔，距今约 250 万—200 万年。这是世界上已知的人类各发展阶段没有缺环、年代前后相继的地区。结合其他考古材料，有些学者认为，现代人的远祖都在非洲，在远古某个时期，他们通过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接触地带的西亚跨洲迁徙。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发现遗址多，研究也深入，19 世纪以来已建立起旧石器文化分期的序列。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为手斧文化和没有手斧的石片石器两大系统；中期主要特征是修理石核技术发展很大，有比较精致的刮削器和尖状器；晚期石器主要用石叶制作，有端刮器、雕刻器和钝背刀等。骨角器也很发达，出现了鱼叉、骨针、标枪、投矛器等新工具，甚至还出现装饰品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品。正因为欧洲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方面处在领先地位，而中国直到 1920 年才发现旧石器，所以，当时西方考古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中国人”是从西方迁移过来的，进而推断出中国文化也是舶来品，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在黄河古象的故乡陇东发现的中国发掘最早的三件旧石器彻底打破了这种推论。

甘肃位于黄河中上游。远古时期，这里温暖、湿润，丰富的水源，茂密的灌木丛，疏松的黄土，为远古人类和多种动物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我国发掘的第一块有确切地点、层位的旧石器就出土在陇东高原庆城县城北约 55 公里处一个叫辛家沟的地方。1920 年 6 月 4 日，法国神甫、博物学家桑志华在辛家沟底砾石层中意外地发现一块石英岩石块，它的形状像锥状手斧，高 4.5 厘米，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 10 万年左右，桑志华将其命名为石核。他们继续挖掘、考察，8 月 10 日，又在距庆城县城 35 公里处的赵家岔黄土层底部沙砾层中发现两件石片刮削器，属于旧石器晚期，距今 1.8 万年—1.5 万年。这是我国境内首批出土的旧石器，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标本。这三件旧石器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工具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有力地证明华夏民族的远祖很早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庆阳出土旧石器的消息吸引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地质工作者、古生物研究工作者前来寻找古人类的踪迹。1922—1932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和

德日进、桑志华在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陕西西部和北部等地，又先后采集到许多零星石器。从打制方法看，大部分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都产生在黄土层底部的砾石层中。1934年，杨钟健在河西走廊西北端的酒泉北部及敦煌附近，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的石器。1963年，西北大学地质系研究人员在马莲河西岸发现了旧石器。同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庆阳县巨家塬（今属西峰区）发掘到一批旧石器。20世纪80年代，甘肃玉门昌马地区再次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大量考古发掘的文物证明，至迟在20万年前就有华夏先民在甘肃大地上活动。全国范围内，经过半个多世纪考察，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距今10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文化有元谋人石器、匭河文化、蓝田人文化以及东谷坨文化等；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第1地点的北京人文化为代表，在南方以贵州黔西沙井的观音洞文化为代表。

这些旧石器文化遗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华夏远祖早在距今100万年前就在神州大地上步履艰难地向前迈进。这也是我们现在依稀看到的我们最早的远祖在大地上跋涉的身影。这个身影来自何方，为何要离开最初的故乡，又是什么吸引他们到达这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还是一个谜团。也许，这种谜团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但是，那个模糊身影出现后，“他”就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新石器时代。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1865年首先提出这一名称。新石器时代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深入。这里农业起源最早，以后又率先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并且在发展中对周边地区产生很大影响，辐射到北非尼罗河流域和欧洲东南部。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三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陶器、出现农业和畜牧业。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陶器，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不很发达。而在中国，三个特征却都齐备。中国大约在1万年前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这大致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时代相当。大约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贝

丘遗址和甘肃大地湾为代表，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经萌芽，个别地点学会养猪。大约前 7000—前 5000 年，华北的磁山文化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可见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陶器则比较发达。大约前 5000—前 3500 年，华北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有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发展。大约前 3500—前 2000 年，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石并用时代，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抹地和土坯铺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预示着文明社会即将来临。

甘肃省发掘了数十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在马家窑、齐家等文化研究上成果显著。但是，甘肃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仅有零星发现，距今 5000 年前的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1978 年开始发掘的大地湾遗址在甘肃乃至全国都是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这个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东北 45 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南以及冯家湾村西，主要分布在葫芦河支流的清水河南岸。考古挖掘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 1995 年，清理出大型原始殿堂 F901 遗址等几百座新石器时代房址和灶址、柱基、灰坑、窖穴、窑址、沟渠等，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兽骨等多件，以及数十万件残陶片。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在仰韶文化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而且将甘肃乃至中国的古文化历史向前推进到距今 8000 年前。同时，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继大地湾之后，渭河流域以及邻近地区相继发现一批同类遗存，仅甘肃目前就已发现 8 处，集中在天水、陇南地区，有天水师赵村、西山坪，西和宁家庄，礼县赵坪、盐关等遗址。1982 年，庆阳地区在宁县董庄遗址考古发掘出一处距今约 6000 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社会形态属母系氏族社会，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渔猎和采摘，制陶业相当发达。据统计，庆阳市境内距今 6000—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百处，按董庄遗址和阳洼遗址的

居室和墓葬等资料推算，每个原始居民聚落平均人口在 25~30 人左右，以此推断，这一时期远古庆阳居民人口就大约有上万人。这表明，那时的古人类已经是主宰庆阳大地的主人，人类文明的曙光已经来临，被称为人文始祖的伏羲、炎黄民族部落就在这一历史阶段相继产生和发展起来。

当远古人类不知不觉地迈进新石器时代这个历史门槛后，我们不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见他们的神情、姿态，而且，能够听清足音和在表情达意时有意识发出的、原始的、含糊不清的音节，通过他们的社会生活遗址及出土文物，还可以推知更多的文化信息。随着历史的演进，就连他们的喜怒哀乐、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等思维情态也逐渐鲜明起来。在地球上，根据截至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从 250 万年前人类远祖从有意识地打制石头工具开始，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直到大约 3000 年前文字出现后才缓缓拉上帷幕。从 3000 年前再往远推，到 5000 年，8000 年，或者更加遥远的史前时期，先民一边行走，一边传承着自己的梦想和历史。而这种传承的方式是从口耳相传开始的，梦想和历史总是交融在一起。最能代表这个阶段文化形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符号，应该首推彩陶。

三、彩陶：雕塑与彩绘的历史

陶器发明以前，人们把食物放在涂着黏土的筐子里，或者放在铺着兽皮的土坑里，然后用烧热的石头把食物弄熟。在用火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黏土被烧硬后可以作为容器使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人类远古史研究》一书中推断说：“人们先将黏土涂在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于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黏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这一观点被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引用，后来又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可和发挥：“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实现目的。”这一发明对后世影响深远，先民不但可以利用这些陶器从较远的地方打水并且储存，还可以从其形状中看到自身的某些影子。陶器生产之初，没有刻意装饰的纹饰，但加工过程中的手捏、片状物刮削、拍打器壁等行为，往往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印痕，这是陶器的最早纹饰。随着先民审美能力增强，有意识地将印痕转变

为成排的剔刺纹、一圈的手窝纹等规则纹饰。早期陶器上大量出现的绳纹是在木棍上缠绕绳索滚压器壁形成的纹饰。后来，起装饰作用的纹饰种类越来越多，逐渐演变为单纯的装饰花纹。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摸索、反复试验、逐步改进，制陶工艺逐渐成熟，彩陶也就应运而生了。例如，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距今约 5500 年）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精致美丽，为罕见文物。这样完美的陶器必然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由此可推断，“抟土造人”神话真正反映的应该是女娲造人像陶器，这也证明，陶器发明后就逐渐融合了实用性和审美性。

彩陶是将各种天然矿物颜料绘制到陶器上，形成五彩缤纷的各类图案，使陶器成为具备了审美功能的艺术品。秦安大地湾已发掘的遗址均有完整或可复原的彩陶出土，其他遗址也发现众多彩陶残片。彩陶是大地湾文化标志性特征之一。根据大地湾、西山坪等遗址的统计，彩陶数量约占全部陶器的三分之一，这表明，甘肃彩陶在问世之初就有一种奔腾磅礴的气势，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甘肃陶器从产生、发展、繁盛到衰落，其历史绵延不断，从未断裂。可以说，甘肃陶器的发展变化史不但若隐若现地对应着神话传说，而且成为连接中国先民从史前蒙昧时代向文字文明时代过渡的重要链条。华夏祖先走过这段历史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憧憬忧患等丰富多彩的内心律动，比较清楚地听到华夏文明在脱胎而出之前的胎音和生命的脉搏。在梳理甘肃的陶器发展变化史之前，我们先参照一下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概情况。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是日本。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 1 万年。这些地区的陶器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画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为绳纹，所以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是篦纹。西亚各地大约在前 7000—前 6000 年先后进入有陶时期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其实是土器，火候很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才出现彩陶。受其影响，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中亚大约在前 6000—前 5000 年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影响。中国在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发现最早约当前 10000—前 7000 年的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但是，20 世纪 20 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兼考